

中文聖經與合一運動（1965-1970）

區可茵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結束後，教廷非常重視研讀聖經，認為這是教會革新的「當務之急」。教宗保祿六世曾接見一群意大利聖經學者，期望科學研經法能配合牧民需要，貢獻教會，「養育天主子民的心靈」。¹ 基督教一直強調聖經研究，教宗的指導能與基督教締造多一個共通之處，有利合一對談。聖經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共有寶藏，但在華人基督宗教內，由於各自有中文翻譯版本，聖經也是分裂的象徵。故此，在華人合一運動中，天主教除了以不同方法推動教友多讀聖經外，與基督教落實通譯本聖經也是當務之急。本文討論在梵二結束後五年內，香港、台灣，以及東亞天主教和基督教聖經專家和教會領袖如何合力推行聖經研讀，並發展中文通譯本的計劃。

1. 聖經文物展覽

自從梵二後，思高聖經學會與聖經公會合作無間。1965年4月20-22日，兩會在香港大會堂舞廳舉辦聖經文物展覽，由香港大學前任校長賴廉士爵士主持開幕禮。² 他在致辭時指出「聖經是天主默示之天書，使人認識惟一的真主，皈依祂打發的救主耶穌基督，而獲得救贖」。他又認為聖經既然是一本重要的書，必須譯成各種文字，讓多人閱讀。³ 出席者還有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白

1 〈教宗保祿接見聖經學者 指出教會當務之急 為誦讀及研究聖經〉，《公教報》（1969年1月17日）。

2 〈聖經文物展覽已經圓滿結束 展出內容豐富詳盡〉，《公教報》（1965年4月23日）。

3 〈聖經展覽特輯〉，《公教報》（1965年4月30日）。

英奇主教、陳伯良副主教、澳門教區戴維理主教、教育司簡乃傑等，還有一眾堂區和修會神父、修女、修士、牧師、信徒等約二百人。在三日的展期中，共有八千人出席。⁴

在展覽期間，雷永明神父（Gabriel Maria Allegra, 1907-1976）和劉義思牧師講解聖經古抄卷和文獻。展出的聖經文物分為八組，第一組是聖經文字的演變，如希伯來文、拉丁文，及其同系古文字，如埃及、巴比倫、腓尼基、古希伯來文的古刻文。⁵ 第二組是聖經原文的各版本及其抄本。第三組是古譯本及其古抄本。第四組展出 1,230 種聖經譯本中的摘要。第五組是古今英文譯本。第六組是唐代景教、元代的天主教譯經、明末清初至今的譯本及抄本、馬禮遜的手稿及所參考的書籍。第七組是聖經歷史地圖及聖地照片。第八組有關聖經與現代生活，展出因應不同人士的需要而編訂的不同聖經版本，如兒童聖經、盲人凸字聖經和錄音、為學者而設的考古及歷史參考書。⁶ 是次展覽由報章和電台報道，令展覽不但吸引基督徒與天主教關注，還有香港市民。⁷ 由於展覽反應熱烈，大受好評，兩會於同年 7 月 13-18 日在九龍佑寧堂再度舉辦展覽，並得到白英奇主教許可。《公教報》的記者形容在四天的展覽中，「參加者極為擁擠」、「絡繹不絕」，大部份為學生。內容與上次一樣，共分為八組。⁸

4 同上。

5 〈聖經文物展覽經已圓滿結束 展出內容豐富詳盡〉，《公教報》（1965 年 4 月 23 日）；類思，〈聖經展覽的檢討〉，《公教報》（1965 年 4 月 30 日）。

6 〈聖經文物展覽經已圓滿結束 展出內容豐富詳盡〉。

7 類思，〈聖經展覽的檢討〉。

8 天主教與基督教再度舉辦聖經展覽（本月十三至十八日假九龍愉寧堂舉行），《公教報》（1965 年 7 月 9 日）；〈第二次聖經展覽 參觀者絡繹不絕 十八日晚始結束〉，《公教報》（1965 年 7 月 16 日）。

香港教區對聖經的重視也影響至澳門，在 1969 年 3 月 16-22 日，澳門主教戴維理舉行聖經週，邀請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主辦，是澳門開教四百年以來首次舉行。⁹ 在聖經週首日，於主教座堂舉行「聖言禮儀」作開幕禮，主題是「天主聖言」，由香港方濟會梁雅明神父講道。¹⁰ 期間於公教服務中心舉行聖經展覽，由澳督夫人剪綵，展出聖經文件、譯本、圖片、地圖等。此外，思高聖經學會的方濟會會士舉行演講，以中文、英文、葡語講授有關聖經的問題。戴主教期望透過聖經週鼓勵教友讀經，讓所有家庭都擁有聖經或福音一本。¹¹

一名筆名為「類思」的作者認為天主教與基督教這次合作，帶有合一意義，讓「不但愛好，而且非常熟悉」聖經的基督徒知道，天主教並非禁止教徒閱讀聖經。此外，他又觀察到在籌備和展覽期間，工作人員的友愛和謙讓，也能促進教會合一。他相信因着梵二對合一的重視，而聖經既是兩教共同相同的，合一是可以實現的。¹²

2. 聖經主日

1968 年，白英奇主教頒布通函，與全球基督教訂明將臨期第二主日（12 月 8 日）為「聖經主日」。香港天主教教區一直有舉行「聖經主日」，但當年特別與聖經公會及全球基督徒一起進

9 〈澳聖經展覽週 內容多姿多采 澳督夫人主持開幕剪綵 主教號召推行聖經運動〉，《公教報》(1969 年 3 月 28 日)。

10 同上

11 〈研讀天書誠要務 演講展覽助推行 澳門教區首次舉行聖經週 邀本港聖學會協助辦理〉，《公教報》(1969 年 3 月 7 日)。

12 類思，〈聖經展覽的檢討〉。

行，實現合一精神。¹³他指示各堂區在當日的講道中，解釋聖經對基督徒及人類的重要性，並將在人數最多的彌撒所收取的奉獻，撥作聖經推廣。他期望透過聖經主日，鼓勵教友和修會合作傳揚聖經，以深入民間。他舉行「聖經主日」是要回應梵二對聖經的重視，特別「要讓全球基督徒獲得閱讀聖經的方便」，讓香港教區內貧窮的家庭起碼擁有一本新約聖經。此外，梵二又建議編印適合非基督徒閱讀的聖經，白主教理解這項艱巨的工作需要與所有基督徒合作，便聯絡聖經公會，以「良堪告慰」。¹⁴

這個「聖經主日」別具合一意義。第一，天主教與全球基督徒一起記念和重申聖經的重要性，正如他說：「基督的家庭，將在這一日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這部天書、這份由我們分享的寶藏」。第二，向教友宣布教區與基督教的聖經公會合作，翻譯和推廣聖經。第三，透過這些合作，共同傳揚福音，他說：「我們深望各基督教會在共同敬愛聖經、共願宣揚天主聖言的立場，將蒙聖神的指引而聯合起來，使我們的傳教工作結出更多的果實」，因為「聖經不是我們這些基督徒的專利品，因為天主號召我們負起向萬民傳播福音的責任。」¹⁵ 1969年，天主教與聖經公會再次舉行聖經主日，該會總幹事與天主教司鐸交換講壇，天主教各聖堂合共捐出港幣一萬元予聖經公會，由艾巧佰神父呈交。¹⁶

3. 中文聖經通譯本的國際討論

13 〈將臨期第二主日 本港基督教會 舉行聖經主日 白英哉主教頒發通函〉，《公教報》（1968年11月29日）。

14 〈聖經主日主教通函〉（1968年11月22日），《公教報》（1968年11月29日）。

15 同上。

16 〈聖經公會週年大會主席 兩教衷心合作 成績表現良好〉，《公教報》（1970年3月20日）。

梵二結束後，教廷認可聖經公會出版的聖經，並鼓勵教友使用，又指示各教區與當地聖經公會共同翻譯、編印、發行聖經。¹⁷ 自此以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紛紛討論及執行聖經通譯本的工作。

至於東亞地區，在 1966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22 日，於日本東京八王子下柚木大學研究所舉行「遠東譯經研究大會」，由日本聖經公會發起，美國聖經公會贊助。會議共有六十九人出席，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韓國、星馬、菲律賓、中國、日本。天主教共有十人出席，包括香港思高聖經學會主任雷永明神父、副主任翟煦神父、陳維統神父，其餘是基督教代表，如台中東海大學文學院顧院長、台北亞洲浸信會神學院周聯華牧師、星馬聖經公會主任謝秉剛長老、香港聖經公會主任溫信德牧師。¹⁸ 在大會期間，英美學者講授譯經的技術、語言學與譯經、猶太文化的主要思想、猶太與希臘文化、如何使譯本現代化和大眾化。各國代表討論譯經的問題及籌備合一聖經譯本。與會者也參與分組討論，中文組的主持人是英國聖經公會外語組普拉斯博士（B. F. Price），他在中國出生和成長。小組合譯了五章《亞毛斯/阿摩斯書》，又討論「天主」與「上帝」、「耶和華」與「上主」等名詞，同意成立委員會解決這些問題。¹⁹

天主教代表在大會期間，每天早上舉行中或英文彌撒，皆有牧師出席，有部份第一次參與。這三星期的會議中，各國和各派與會者在禮儀、討論、用膳中建立友誼，為日後共同譯經建立友

17 將臨期第二主日 本港基督教會 舉行聖經主日 白英奇主教頒發通函》，《公教報》（1968 年 11 月 29 日）。

18 陳維統，〈合一的基礎——聖經〉，《鐸聲》，第四卷，第十二期（1966 年 9 月 15 日），頁 69-70。

19 陳維統，〈合一的基礎——聖經〉，頁 70。

好基礎。在閉幕禮上，美國聖經公會總書記乃達（E. Nida）發言，成為大會的宣言：「雙方的聖經學者很相接近，只是需要時間來為雙方的教徒作心理的準備」。²⁰ 與會者認為譯本應「現代化、大眾化、普及化」，使中學程度的信徒，以至非信徒都能明白。部份基督教與會者認為思高聖經「文詞過高」，而思高學會正重譯聖經，在大會中汲取了寶貴意見。²¹

香港天主教代表出席了這次國際譯經大會後，有利在本地推動合一譯經工作，加上天主教香港教區認可聖經公會的中文譯本，並在思高聖經學會及公教真理學會發售，這在梵二前是不可思議的。²² 香港天主教徒一直渴望見到聖經通譯本，最終在 1968 年初露曙光。白英奇主教委託香港思高聖經學會雷永明、翟煦、陳維統三位神父，多次與香港聖經公會商討合作事項，代表包括赫健士副按察司、溫信德及徐立兩位牧師。²³ 雙方經過多番討論後，同意發表以下聯合聲明：

- 一. 兩教會機構發售彼此所出版之聖經；
- 二. 兩教會共同舉行聖經主日，將該主日之奉獻撥作及發行聖經工作之經費；
- 三. 雙方繼續密切研討，尋求一種為雙方同意採用之中文聖經譯名；
- 四. 天主教兩位代表已應允擔任香港基督教聖經公會諮詢委員會委員。²⁴

²⁰ 同上。

²¹ 陳維統〈合一的基礎——聖經〉，頁 70-71。

²² 〈將臨期第二主日 本港基督教會 舉行聖經主日 白英奇主教頒發通函〉。

²³ 〈為推廣聖經翻譯通用本 公教與聖經公會 已達成合作協議〉，《公教報》（1968 年 7 月 19 日）。

²⁴ 同上。

當時天主教與基督教的聖經公會在傳揚聖經方面「已達密切之合作程度」。²⁵無可否認，要解決術語和名詞的分歧並不容易，但兩派代表都樂意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如《公教報》社長所言：「使我們欣喜異常」。²⁶自 1968 年起，天主教與聖經公會往來頻繁，當年公會的年報詳細記述雙方的合作，陳維統神父更在 1969 年獲邀出席公會的週年大會，並發表演說，公開表明「聖經是天父寫給我們的家書」。²⁷

1970 年 6 月 25 至 7 月 4 日，台中東海大學舉行「東亞聖經翻譯研討會」，由台北聖公會主辦，目的是響應合一運動，商討天主教和基督教聯合出版中文聖經。²⁸出席者來自韓國、菲律賓、越南、泰國、新加坡等地，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派遣陳維統及韓承良神父出席，他們同時也是台灣主教團代表，郭若石總主教還派出耶穌會房志榮神父和方濟會劉緒堂神父，分享譯經的經驗。台灣聖經公會在同年 8 月 3 日在台北召開「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座談會。天主教代表包括房志榮、方豪、劉宇聲、王秀谷；基督教代表有賴炳烟、許日新、陳哲宗、雷法章。會議討論成立工作委員會、聘請員工開展工作，期望在五年內完成。²⁹

雖然合譯通用本聖經將要實行，但雷永明神父基於以下原因，退出這項計劃。第一，東亞會議的「指導原則」要求用一個已有的譯本為基礎，再作修訂，但雷神父認為這涉及選用基督教

25 同上。

26 〈社論：合作翻譯聖經〉，《公教報》(1968 年 7 月 26 日)。

27 〈陳維統神父昨出席 聖經公會週年大會 年報詳載該會與公教關係〉，《公教報》(1969 年 3 月 21 日)。

28 〈二教假台中東海大學舉行 東亞聖經翻譯會議 港方派兩代表出席〉，《公教報》(1970 年 6 月 26 日)。

29 〈合一運動又一好現象 兩教聖經統一本 雙方積極籌商中〉，《公教報》(1970 年 8 月 14 日)。

或天主教版本的爭議，建議應由新的委員和專家重新翻譯。³⁰ 第二，雖然許多中國主教、神父、教友願意放棄「天主」而改稱「上帝」，但他堅持前者，因為「天主」（**Lord of Heaven**）更符合聖經，《出谷記》等舊約經卷都用這個稱呼。此外，許多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因「天主教」之名而受逼害，更不可輕言放棄。³¹ 第三，思高聖經修訂本在 1969 年已出版，思高的方濟修士不是制訂新譯本的理想人選，所謂新酒不應放在舊酒瓶內，應該讓新成員加入。第四，思高的神父工作繁忙，負責任教慕道班、為修女安排聖經課程，徐誠斌主教吩咐他們任教修院的聖經科，無暇參與通譯本的工作。³² 第五，他們自 1967 年已開始撰寫中文聖經辭典，他認為這個工作也對通譯本有幫助。³³

雖然中文通譯本聖經的計劃告吹，但合譯台語版聖經的過程順利。戴道輝神父（**Albert V. Fedder, M.M., 1910-1999**）是拉丁文專家，在菲律賓聖經公會主席 **Rev. James Moorhead** 的指導下，與基督教聖經專家為山地原住民翻譯書信及福音為台語。他在 1937 至 1952 年在廣西傳教，曾任聖家修院（**Holy Family Seminary**）校長。1951 年，他與顧倫神父（**John Curran, M.M.**）被共產政權軟禁十七個月，承受殘酷的批鬥，後被驅逐出境，逃到香港。瑪利諾會派遣他到台中工作，擔任該會語言中心的總監。在梵二前，

30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 'A Few Thoughts about the Common Translations of Bible in Chinese', *Vox Cleri*, 8/10-11 (July-August 1970), p. 24.

31 同上。

32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 'A Few Thoughts', p. 25.

33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 'A Few Thoughts', pp. 25-26. 《聖經辭典》於 1975 年完成，共 2,630 條，1,136 頁，內有四個附篇、插圖 58 幅、七個彩色地圖。房志榮神父讚嘆說：「以今日中華教會人力、物力、才力觀之，不可不謂一本巨作！」（房志榮，〈聖經辭典〉，《神學論集》，25 期(1975)，頁 457。）

他與一些天主教傳教士對基督教懷有敵視態度。但梵二後，他的態度完全改變，在 1967 年寫道：

我們那些曾在中國宣教監牧區工作的傳教士慨嘆我們自身的經歷——我們的狹隘、懷疑、敵視、偏見，天主教和新教的傳教士幾乎毫無任何對話和合作，然而，我們本身來到中國是要宣揚基督的信息。³⁴

他非常欣賞基督徒的犧牲精神，並說：「我們為一己的盲目感到羞愧，我們對這些熱誠和積極的基督教弟兄視而不見。他們為福音鞠躬盡瘁，而這個福音正是我們遠道而來所宣傳的。」³⁵ 他與基督教聖經專家合譯台語版聖經，身體力行地實踐合一，為原住民帶來基督宗教的共同語言，有利他們的合一運動。

4. 思高聖經合訂本的合一元素

雷神父退出中文聖經合譯本的工作固然可惜，但他與其他方濟會修士合力編著的合訂本，別具合一精神。除了使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更為一般天主教教友容易明白外，也使基督徒以至非信徒都能明瞭，在比較兩者的譯本時，可增進彼此對同一經文的了解，有利神學交談。

學會在 1945 年 8 月 2 日在北京成立，1946 年譯成《聖詠集》；1948 年完成「梅瑟五經」；1953 年譯成舊約，共八大冊，皆按原文譯出，並附有學術性引言和詳細注解，供司鐸和學者參考。³⁶ 學會在 1950 年遷至香港，田耕莘樞機吩咐改良中文新約譯

34 Albert V. Fedders, 'Ecumenism in Taiwan', *Vox Cleri*, 7/7 (April 1967), p. 24.

35 Albert V. Fedders, 'Ecumenism in Taiwan', pp. 25-26.

36 Bernward Willeke, O.F.M.(著)，趙雲岷(譯)，〈中文聖經的演變〉('Das Werden der Chinesischen Katholischen Bibel')，《新鐸聲》，第 35 號(1961 年 5 月 1 日)，頁 91。

本，以符合希臘及拉丁原文，並以現代中文表達，還要加入現代學術上的註解。新版本在 1957 及 1959 年分兩卷出版，加入要義後，在 1961 年以三卷出版。新舊約聖經共十一冊，約 9,480 頁。後來，學會出版了《袖真本四福音》、《天國喜訊》、《新約全書》。³⁷

為配合梵二對聖經、合一、禮儀等方面的指示，該會於 1963-1967 年為固有譯本進行徹底修訂，在 1968 年出版合訂本，大幅減至 2,060 頁。³⁸ 學會考慮梵二的禮儀改革，尤其是採用當地語言進行禮儀，在重譯時並不只考慮「讀」，也注重「聽」，遂採用通俗白話，特別為《聖詠集》放棄了無韻文的翻譯，而作有韻文的翻譯。此外，根據《啟示憲章》3:12 的指引，學會在每部書卷前加入引言和簡單的注釋、總論、導論。³⁹ 他們將引言和注釋縮短，以配合教會的指引，以祈禱和默想的方式讀經。又加入三個附錄，包括「歷代大司祭一覽表」、「聖經與世界大事年表」⁴⁰、「聖經教義索引」⁴¹。學會別具心思，臨摹「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聖經」、「舊約」、「新約」的字體，引導中國教徒慎終追遠。⁴²

37 Bernward Willeke, O.F.M. (著), 趙雲岷 (譯), 〈中文聖經的演變〉, 頁 91; 思高聖經學會, 〈中文聖經合訂本〉, 《公教報》(1968 年 12 月 20 日)。

38 思高聖經學會, 〈中文聖經合訂本〉。

39 同上。

40 這個附錄特別為中國教徒而設，學會有以下說明：「在這表內，我們以編年體，將選民的歷史，以及與選民有關的其他民族的歷史，和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加以比較，並列表闡明，我們認為這一附錄，可使我國同胞，更方便有效地傳誦救恩史。」(思高聖經學會, 〈聖經序〉)。

41 這個索引是為配合梵二《啟示憲章》6:24 的指引而編製，學會解釋索引的「目的是使信友迅速而無誤地，直接從聖經中吸取天主啟示的各端要理，走上愈顯天父的光榮，生活於基督內的康莊大道……希望每位讀者藉此索引，能將救恩史的大綱，加以質的擴充和量的增補。」(思高聖經學會, 〈聖經序〉；〈中文聖經合訂本〉)。

42 思高聖經學會, 〈聖經序〉。

學會根據國際聖經學者最新發現的資料及原文，即希伯來文、阿剌美文、希臘文，將以前的譯文全面修訂，更重新翻譯舊約。⁴³ 遇有艱深的經文，便參考古譯本，而非採用近代學者的推測。至於基督教所謂的「次經」，學會參考「西乃抄卷」來翻譯《多俾亞傳》及《友弟德傳》。雖然《德訓篇》從希臘文翻譯而成，但他們參考當時在開羅古會堂的舊書庫中找到的文獻，並在死海附近的古木蘭，及 1965 年在死海西岸的瑪撒達（Masada）發現的希伯來文殘卷。⁴⁴ 他們為了解希臘譯者的原意，遂將希臘本與拉丁本及敘利亞培西托譯本比較。他們也保留拉丁通行本特有的辭句，章節也以此來排列，因為甚多拉了經文與希伯來文殘卷與敘利亞譯本極為脗合，而且教會在歷世歷代在禮儀上採用了這些經文。⁴⁵

為了配合合一運動，他們參考 1966 年基督教五個聖經公會聯合出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The Greek New Testament*）。此計劃由美國聖經公會發起，蘇格蘭、英國、荷蘭、符騰堡（Wurttemberg）聖經公會參與，於 1955 年成立了專家委員會，艾朗德（Kurt Aland）、白賴克（Matthew Black）、墨則格（Bruce Metzger）、魏革倫（Allen Wikgren）為主要成員，負責校勘。這本聖經為聖經譯者而設，提供可靠的希臘文文本。第一版在 1966

43 思高聖經學會，〈聖經序(1968年8月15日)〉，《公教報》(1968年11月8日)。

44 在 1896、1900、1930、1956 年及以後，聖經學者不斷發現《德訓篇》的手稿，三分二的希伯來原文已經找到，與希臘譯文相符，而在瑪撒達找到的部份是公元前的譯本。雖然猶太教經師不承認《德訓篇》為正典，但最遠古的希臘和敘利亞聖經譯本都把此書放在書目內，所以天主教仍然承認它為正典，而基督教則跟隨猶太教，列為次經。〈德訓篇引言〉、*The Wisdom of Ben Sira*，〈《舊約全書(中英對照)》(加州：明望社，2014年)，頁 1495-1496。

45 思高聖經學會，〈聖經序〉。

年發行，更新版在 1975、1983、1993、2014 年陸續推出。⁴⁶ 雖然學會並非完全同意該版本的內容，但他們「仍遵守了有助合一運動的措施，尊重而參考了他們的意見」。⁴⁷

學會趕及在 1968 年聖誕節前出版合訂本，作為送給教友的聖誕禮物。⁴⁸ 合訂本推出後，反應踴躍，不久已全部售罄。⁴⁹ 為了讓信徒容易手握一本聖經，方便研讀，學會在 1969 年 9 月出版《新約袖珍本》，附有地圖、圖解和附錄。⁵⁰ 學會將修訂本呈獻教宗保祿六世，他特意致函感謝方濟各會總會長，表示「不勝欣喜，因為它象徵着聖方濟各會會士對教會首牧的愛戴；這精美的譯本使我們之間更為接近」。他也欣賞會士的才能，克服翻譯的困難，使中國人認識福音。⁵¹

5. 總結

梵二後的五年間，香港和台灣以至東亞區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努力推廣聖經研讀，也探討中文通譯本的可能性，但無奈計劃無法實現。直到今天，華人基督宗教仍未擁有一本通譯本聖經，天主教沿用思高版，新教近年採用「和合本修訂版」。主要中文名詞仍未達成共識，如「上帝」和「天主」、「聖靈」和「聖神」、「稱義」和「成義」、「主禱文」和「天主經」、「阿

46 <https://www.academic-bible.com/en/home/scholarly-editions/greek-new-testament/greek-new-testament/> (登入於 2016 年 5 月 10 日)。

47 思高聖經學會，〈聖經序〉。

48 〈本教區預慶聖誕 聯歡會接踵而至〉。

49 〈思高聖經學會出版 新舊約全書面世 各界人士相爭購〉，《公教報》(1969 年 1 月 3 日)。

50 〈思高學會獻新猷 新約縮影本問世〉，《公教報》(1969 年 10 月 3 日)。

51 〈教宗致函聖方濟各會總長 謝贈中譯聖經 嘉許思高聖經學會工作 (1969 年 9 月 8 日)〉，《公教報》(1969 年 10 月 3 日)。

們」和「阿孟」等；眾多聖經人物、書卷、地理名稱都異常不同。在合一聚會的禮儀程序中，經常用斜劃（/）來表示兩派不同的名詞，以示對兩派的尊重，但往往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事實上，這個符號突顯兩派在某些教義上尚未達成共識。這個表示尊重的符號使兩派教徒繼續安於兩套不同的名稱，不求統一。不同的名稱又使非信徒以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兩個不同「宗教」，而非「教派」。由基督教宣教士來華，直到今天，中文翻譯的分歧仍是華人基督宗教合一運動的死結。

宗教語言涉及各派教會的神學，假如各派以合一為目標，邁向更接近的神學詮釋，合一的語言便有望實現。然而，宗教語言是心靈的語言，信徒慣用特定名詞向上者祈禱和敬拜，難以一時改變，這比語言作為頭腦上的概念更難解決。雖然在華人基督宗教內，實現通用聖經和神學詞彙困難重重，但只要這個問題解決，華人基督宗教的合一運動將會暢通無阻。